

为“青年农场”树碑立传

林宗源

1960年，房山县良乡马场的村北、稻田村南，矗起两座面南背北的大楼，当时周围农村没有楼房，这两座大楼很惹眼，当地人以大楼为标志，称这里为“青年农场”。人们习惯说成的“良乡马场”，在长阳农场东部，现今属长阳镇，因此，“良乡马场”改称“长阳马场”更确切。

青年农场如何在这里安家、发展的？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过的历程密切相关。

茶淀建场

1957年，党和政府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成为新一代有文化的农民。当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中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长篇社论，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社论号召：“现在已经得到了书本知识的中小毕业生，应该毅然决然地、愉快积极地投入到生产劳动中去，特别是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获得生产斗争的实际知识，使书本知识和实际知识结合起来，促进自己的提高和发展。”这篇社论经刘少奇同志亲自修改定稿。社论发表后，北京全市学校立即行动，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举办报告会，大力宣传。全市73所中学约12600名学生参加劳动锻炼。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的彭真同志，提出办青年农场的建议，场址最初设立在市公安局所属的茶淀清河农场，招收的对象是城市户口、年满16周岁的中小毕业生。北京市城市青年热烈响应，踊跃报名，先后共招收1980人，其中高干子女70余人。其中有朱德、康克清同志的干女儿杨雪英，她是革命烈士毛泽覃之女，后改名毛雪

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同志的儿子张虹生，肖劲光大将的女儿肖凯，李涛上将之子李新民，著名国际主义战士马海德之女周良弼等，四年后，刘少奇同志也把儿子刘允真送到这里进行学习、接受锻炼。这些高干子女没有优越感，和普通青年人打成一片，体现了当时高级干部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和没有特权思想。

1957年10月5日举行了隆重的建场典礼，彭真同志题写“青年农场”场名，中共北京市委教育部长廖沫沙同志授场旗。1958年4月21日，中央领导彭真、贺龙、聂荣臻、杨尚昆亲来农场看望并联合题词：“鼓足干劲，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加强锻炼，提高政治觉悟”。《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各大报刊刊载了有关宣传青年农场的文章。

鼓足干劲，发展社会主义
农业生产，加强锻炼，提高政治
觉悟。

彭真 贺龙 聂荣臻 杨尚昆

当时，茶淀青年农场场长是梁文英，第一副场长刘宗藩，第二副场长曹万敖，第三副场长王振海（老红军）。不久，31岁的刘宗藩任青年农场场长，王振海担任副场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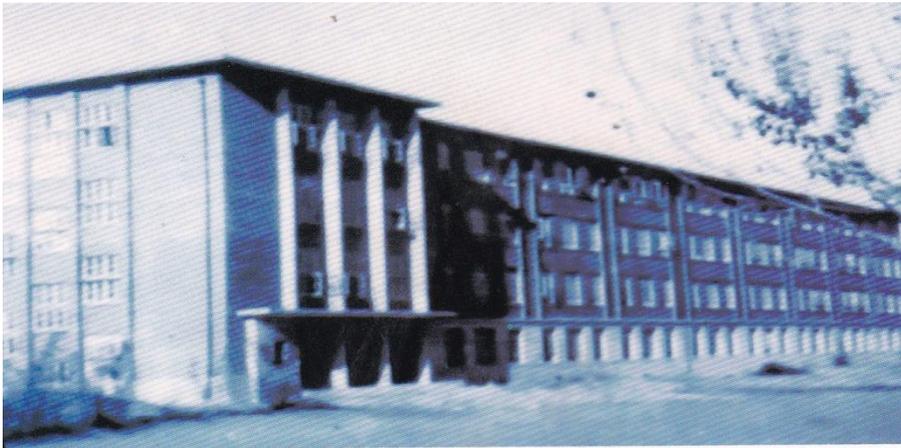
迁址长阳马场

1960年1月，根据北京市委的指示，青年农场从茶淀迁往房山县长阳马场，同时名为北京市农业技术学校。《北京青年报》发表《又是学校，又是农场，向知识分子工农化的道路前进》的署名文章，是当时给予青年农场的定位。

校址原为北京市教育局劳动基地，位于永定河畔，永定河还有滔滔河水，周围黄沙滚滚，鸟兽出没，到处是盐碱沙荒，被称为当地的“北大荒”。初来时，学生住帐篷，冬未尽，春未来，寒冷刺骨，风一起，饭碗里刮进沙粒；夜晚睡觉没有暖气，不得不戴上棉帽、捂紧口罩。在市委刘仁等同志的关怀下，入住临时腾出的饲料棚，后移至新建的大饭厅，直到1960年9月宿舍楼建好后，迁入宿舍楼。当时，第一个任务是建校和规划校区。市委指示建造一座教学楼和一座宿舍楼。在规划校区中，校长刘宗藩倡议召开劳动比武大会，通过师生的双手，开垦农田1600亩，划分为三个区，一个区种水稻，一个区种旱田，一个区建果园、种蔬菜。

建校的第一个工程是建设这两座大楼，另建学生饭厅。北京市规划管理局设计图纸。两座大楼于当年6月启动。建楼从始至终，学生都贡献了力量。他们经过茶淀农场的劳动锻炼，身强体壮，热情高涨地投入建校，不怕苦，不怕累，成为建设中的生力军。建筑公司派出瓦木工、架子工、电工及水暖工等，壮工活由学生承担。首要任务是开挖地基，即大楼底槽。因6月开工，天气预报称7月有大雨，要赶在雨季来临前，完成地基开掘任务和部分基建工程。学校立即决定，停课两天，大干苦干。针对沙性土壤特点，采用开槽后放白灰大水漫灌方法，使地基牢固。学生搞突击，在科技人员指导下，开掘挖槽，运水运灰，多拉快跑，按质按量完成。基建中，他们绑扎钢筋，搅拌水泥，填土运砖。天气炎热，

汗水蒸腾，没有怨言，得到工程负责人的称赞。经数月奋战，和建筑工人共同完成宿舍大楼的建设，宿舍楼于当年9月竣工。同时经5个月的奋战，完成教学大楼的封顶。同年11月教学楼竣工。两座高楼拔地而起，巍然壮观，加上容纳千人的大饭厅，形成青年农场的壮美格局。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座大楼历经57年，直到现在仍然非常坚固，作为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楼，与新的楼群并排而立。



新建成的教学楼

经过一年的艰苦创业，师生开主渠，建支渠，引水造田，完成32000方的土方工程，包括田间灌溉配套工程。完成1600亩的土地平整。在盐碱沙荒中开垦出良田，开辟果园。水田开垦400亩。菜园开垦120亩，其余是旱田；栽种果树和造林15000株，修建猪舍、鸡舍40间，一个初具规模的青年农场在房山县的长阳马场展现出来。

青年农场的建制

青年农场传承“延安抗大”的管理模式，实行“生活集体化、行动军事化、劳动战斗化”。农场人形成“以农为荣、艰苦奋斗、积极劳动、以场为家、热爱集体、团结互助、努力学习、遵守纪律”32字场训。

行动军事化，体现于学生管理。开始组建农场，被招录者称为农场职工，后来称为学生。以区队为建制，营下有连，连下有组，每组12—18人不等，班组的男女生分开。经过不断改进，到1960年迁移到长阳马场，建制趋于精细，分为中队和班，每个班一般为14人，几个班组成一个中队，即为班集体。还是男女分开。军事化的管理，使学生加强了组织纪律性，32字场训，使青年农场一体化。劳动时的出工与收工，学习时的上课与下课，集体活动时的组织形式，队列整齐，行动一致，使受教育者得到很好的锻炼。班组内部，通过小组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时纠正错误，端正方向。每个成员都在不同阶段写出思想总结，如季度总结、年度总结。场部通过表彰先进、树立典型来强化管理。

1957年刚开始组建青年农场，对生员的要求除了生产劳动，以及劳动之后的学习，场校合一的概念尚未明确。1957年12月5日，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张文松来到青年农场，代表市委传达，决定青年农场改成半工半读，场校合一的性质得以明确。1958年4月21日，彭真市长与农场青年座谈时，征求了意见之后说：“……从今天起就把你们的青年农场改成学校吧！半天念书，半天劳动。”（引自《如歌岁月》中李增高的文章《亲切的关怀》）。标志半工半读学校的确立。1958年7月2日，举行了开学典礼，大会上，刘宗藩同志总结：经过十个月劳动锻炼，初步奠定了同学们对劳动的认识，为今后的办学打下良好基础。

这种劳动学习相结合的制度，是对延安抗大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到1960年1月青年农场搬迁到长阳马场之后，筹建教学大楼，挂牌北京农业技术学校，刘宗藩同志被任命为校长。也就是这一年6月1日，刘宗藩同志代表青年农场，

光荣出席全国文教系统先进单位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青年农场里的青年人

青年农场是个大熔炉，把成百上千的年轻人锻炼和培养成农业、教育、公安各条战线优秀的人才。

青年农场育人可概括为刘宗藩校长的四点经验：1. “田间变成大课堂”，调动学生的劳动积极性。2. 实行劳动结合军事化，以整顿纪律作风。3. 开展文娱活动，实行“自编、自演、自欣赏”。4. 开展自我教育，评比表扬先进。

首先要适应这里艰苦的劳动。在北京城市里生活惯了的学生娃，哪里体会得到劳动的艰辛。根据老青年农场人的回忆，开始投身农业生产，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要过劳动这一关。劳动一天，几个小时下来，腰疼腿酸，躺在床上都顾不得洗脚。经过一个阶段的锻炼，慢慢适应。年轻人都决心做新一代的农民，克服艰难困苦。其次是学习劳动技能，年轻人也不甘落后。一次，记者看到一位小姑娘学习割稻子，累的满脸通红，旁边的辅导员教她如何握镰刀，如何拢稻秆，结果还是动作生硬，镰刀不听使唤。记者问她的名字，哪个学校来的。她打量了一阵记者，说：我知道你是记者，我才不告诉你。你明年这个时候再来吧，我一定会告诉你。（《北京青年报》1957年10月8日 记者 何才海）从这个报道的片段能够见到，当时这里的年轻人是如何立志学好农业，扎根农业。也有的文章这样写道：“青年们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吃完早饭，就扛着锄头，拿着镰刀，成群结队下地去了。在田间，边说笑，边干活，还偷偷地和临近的小组比赛。收工的时候，田野里到处荡漾着‘唱起来，跳起来，工作完了多愉快’的歌声”（《劳动中乐趣无穷，新农民志在田园》

原载《北京日报》1957年10月3日)。一年的农业劳动锻炼，学生学会修渠、打埂、整地、播种、育苗、插秧、除草、施肥、脱粒等多种农活，有的还成为庄稼里手。青年人脸晒黑了，手变粗了，身体结实了。春天插秧，是最累的劳动，规定每人不少于四至五分地，有的女生都插了七分地。而插到八分地，就被评为插秧能手。农场充分动员，组织十比竞赛。这“十比”是：1. 服从领导 2. 钻研技术 3. 保证质量 4. 突破定额 5. 团结互助 6. 遵守纪律 7. 爱护工具 8. 出勤率高 9. 安全生产 10. 搞好卫生。

劳动锻炼了自身，劳动改变了思想，劳动创造了财富。这就是青年农场年轻人的回答。



另一项任务是紧张的学习。经过一年的劳动锻炼，1958年7月，北京市委决定青年农场开设农业中等技术学校。开设的科目有农学、畜牧、农机、企业管理等，也开设语文、数学、化学等基础课。农场师生一面生产，一面编写讲义，开学了，教室不够，就利用饭厅、仓库，甚至牛棚，有时甚至在露天上课。实验设备不够，就日夜两班倒。老师们在田间地头，根据不同农业季节讲解农作物、果树等栽培、育种技术，把田间变成课堂。到1960年，每周规定4天学习，2

天劳动，教学与生产密切结合，结合生产任务，按照教学计划，进行系统的专业技术教育。工读的特点，根据农业的季节，农忙时少学，农闲时多学。生产任务紧急时，停课劳动。例如《青年农场及北京农业技术学校大事记》（作者 李增高）中：

“1960年5月25日，计划停课两周，进行水稻插秧。总面积为400余亩。”

“1960年6月4日，停课结束，共11天，提前完成生产任务。”

学生的学习热情，产生于劳动实践。有一个叫范治钧的年轻人，父亲是造林局干部，在家时教给儿子林业知识，小范总是听不进。来到青年农场，经过劳动锻炼，对农业理论产生浓厚兴趣，从家里把父亲的100多本农业理论书籍带回来了，他爱上了农业理论研究。

学生做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团委和学生会在党委的领导下，自办广播电台，自办校刊，组织各项检查评比和文体活动。学校的大饭厅，打扫卫生，收拾器皿，布置环境，都是学生自己，没有使用一个勤杂工。

媒体对青年农场的宣传

青年农场成立之后，这一新生事物，得到充分的宣传报道。重要的报刊有《人民日报》，1957年10月10日的报道《欢腾的青年农场》（记者戴月）发表后，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而且被编入当时的中学语文课本。《北京日报》报道青年农场的人物、事迹最多，也最频繁，许多重要事件，如建场典礼等，以及《永定河畔的劳动赞歌》等等，都是《北京日报》宣传报道的。《北京晚报》也不甘落后，相继报道

了青年农场的情况，曾经在1958年10月9日和10日，连续发表《青年农场见闻》上下篇。1960年9月6日，《北京晚报》还报道了《北京农业技术学校被评为先进》，报道青年农场被评为全国文教系统先进单位的光荣事迹。《光明日报》在1960年10月11日也发表了《成长中的一代新人》，反映青年农场发展为北京农业技术学校的奋斗历程。《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也多次报道青年农场的火热战斗生活。《北京青年报》写出了《生活的起点——青年农场建场典礼侧记》等重要文章。

除了这些报刊，对青年农场做出宣传的还有《新观察》、《中国妇女》、《新港》文学季刊、《儿童文学丛刊》、《中国农垦》等等杂志。

1958年2月，中央新闻电影记录制片厂，拍摄了青年农场年轻人在茶淀七里海挖肥运肥的劳动场面。1961年4月，北京电视台为青年农场拍摄电视新闻。

媒体宣传有大块文章，也有小型消息，如《北京晚报》一则消息，连标题才寥寥96字，内容为：

参加农业生产去！

本市中学毕业生四百五十人，开始走上光辉的战斗道路。昨天下午三时，它们离开北京，去到茶淀青年农场。他们是本市第一批去这个农场的知识青年，他们是祖国第一代的新式农民。

照片是学生们走向前门车站的情景。

（短消息右侧配发照片 略）

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叶圣陶，还热情写诗，赞扬青年农场的年轻人（两首选一）：

拾 粪

天还没亮，
我们的小组自动去拾粪。
有空的时候，
也背个筐子去走一阵。
筐子里满了，就利用
我们的兜儿和围巾。
碰见大车眼睛发亮，
尽在牲口后边跟。
我们好比贪财汉，
说给你听也许不信，
看见了粪真是亲。
今年过长江，
生产大跃进，
肥料是宝贝，是保证，
你就会知道，
我们哪儿来的这份心。

1958年6月号《新港》

青年农场自身开办《青年之声》的广播，开办《红专》小报，定时定期宣传报道，起了很大作用。当年，李增高同学写了大量诗作歌颂青年农场的学习、劳动和生活，其中的一首小诗发表在校报《红专》上：

青年农场歌声多，
一人歌唱众人唱。
歌儿本从劳动起，
劳动愈好歌越多。

青年农场——培育人才的摇篮

党和国家很重视青年农场，通过不同的方式培养和选拔人才。农场当年曾选拔 300 多位高中毕业生，到高等学校进一步深造。曾经担任国家水利部长、后来担任河北省省长的钮茂生同志，就是这 300 多位中的一位，后来成为在青年农场进行锻炼、走向领导岗位行政级别最高的同志。苏月华，青年农场中锻炼成长的一位女青年，在 1958 年，被评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代表大会，受到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青年农场即北京农业技术学校 1961 年的第一届毕业生 800 余名被分配到北京市农业、教育、公安三个系统。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忠于职守、兢兢业业，成为基层工作的骨干力量，有的还晋升到重要的领导岗位。

多年之后，各届毕业生中，涌现出无数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分子，他们当中，有新闻工作者、市少年宫主任、书法家、高级教师、警察教官、中学校长、报社主任、市区政协委员，等等。

最为显著的，还是农业林业人才。

全国劳模于大源，毕业后工作在林业战线，以他出色的成绩被各级领导赏识，成为青年农场人的骄傲。

育种专家李增高，多年跟水稻打交道，研究培育出高产糯米“京糯一号”“京糯三号”，国内一些有影响的科技刊物相继刊载，全国 22 个省市的 1000 多个农业基层单位，引种了“北京的糯稻”。

科普专家刘永生，毕业后热心普及果树、蔬菜、花卉知识，在北京市中小学开展农业科普宣传，早在 1962 年就建立一个“红领巾中小学农场”和一个“红领巾畜牧场”，1984 年成立“北京市青少年昆虫爱好者协会”，会员多达 3000 余人。他从少年宫工作到从事生物教学，完成生物课题 200 多个，发表论文 200 多篇。

小麦专家冯泉，62 届毕业后分配到长阳农场担任技术员，培育出小麦长丰 1 号、2 号、3 号优良种系，具有高产、早熟、抗伏、短杆的优良性状，在京郊推广面积达 80 万亩，获得北京市科技成果二等奖。

农业专家黄家骥，毕业后在长阳农场第四大队搞农业科技研究，利用筛选法解决小麦死苗现象，这一科技成果被北京市农科院土壤管理所检测认定，获得农场管理局农业科技一等奖。

高康，梨园农场普通职工被推荐为场领导，一心为职工，农场经济效益大提高，奖励他的 50 万元分文不取，全部发放给职工。不幸英年早逝，为他送行的队伍达千余人，哭声一片。

农学专家吴绍宇，1965年毕业，致力于培育推广玉米杂交工作，获得成功，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青年农场涌现的优秀人才，简直难以数计，以上人物仅仅是其中的代表。

为青年农场树碑

文革期间，青年农场即北京农业技术学校被“军管”。文化大革命后期，1972年10月，根据中央和国务院决定，4890部队炮兵团退出占用的校园，1974年恢复教学制度，刘宗藩再任北京农业技术学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办两年制中专班。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学校恢复正常教学。学校早在1965年，就更名北京市农业学校。1980年被列为全国重点中专，1986年7月，学校改由市农林办公室领导。校长刘宗藩1985年离休，继任者先后有倪嘉立、王振如两位校长。2001年7月，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学校与北京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合并组建成立北京农业职业学院，成为学院的南校区。

2012年初，原青年农场的老毕业生联合申请为青年农场立碑，他们撰写了碑文。笔者有幸接受学院党委副书记周广和同志的指派，参与了碑文的修改工作。学院于2013年6月举行校史文化碑落成仪式。石碑长24米，高5米，由花岗岩砌成，四组碑体相互衔接为一个整体，矗立在学院主楼东侧，碑文全文如下：

碑 文

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传达党中央指示，号召初、高中毕业生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做第

一代有文化的新式农民。根据彭真同志建议，北京市决定，将市公安局所属茶淀清河农场第三分场改建为青年农场。同年八月，两千余名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其中含中央领导及高干子女或亲属七十余人）听党召唤，奔赴茶淀，立志做有知识的新型农民，首都举行盛大欢送仪式，各媒体广为宣传，轰动全国，推动了知青参加农业生产的热潮。

一九五七年十月五日举行建场典礼，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市长的彭真同志亲自题写“青年农场”场名。青年农场传承“延安抗大”的管理模式，实行“生活集体化、行动军事化、劳动战斗化”。农场人形成“以农为荣、艰苦奋斗、积极劳动、以场为家、热爱集体、团结互助、努力学习、遵守纪律”良好场风。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彭真、贺龙、聂荣臻、杨尚昆四位中央领导亲临青年农场慰问并联合题词：“鼓足干劲，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加强锻炼，提高政治觉悟。”青年学生深受鼓舞，为日后建校指明方向。

一九五八年，根据中共中央“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精神，市委决定将青年农场更名为北京农业技术学校。同年七月二日，学校举行开学典礼，首任校长刘宗藩。学校发扬优良传统，“以农业为荣、以劳动为荣、以艰苦为荣”，半工半读，边读书、边生产、边实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九六零年一月，学校由茶淀迁址回京，即今长阳镇马厂（现北京农业职业学院主校区院址），因艰苦创办学校成绩显著，被评为全国文教群英会先进单位。一九六一年首届毕业生奔赴首都各条战线。一九六五年三月经批准更名为北京市农业学校，一九八零年十一月被教育部列为全国重点中专。

半个世纪以来，学校服务首都、富裕农民、繁荣京郊、培育大批良才，成果卓著。

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学校与北京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合并组建成立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院秉承青年农场人和几代农校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荣获全国文明单位和北京市职业教育先进单位称号，二零一一年七月以优秀的验收成绩成为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

中共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委员会

（感谢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宣传处李秀华等各位负责同志对此文撰写的帮助和支持！）

参考资料：

1. 《如歌岁月》青年农场建场五十周年回忆录编委会
2. 《如海深情》—缅怀刘宗藩校长主编 李增高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3. 《北京市农业学校校史》